

鶴佬人看客家人

——促進閩客團結的一些省思

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三日，我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演講「台灣鶴佬語方言分佈」，《客家風雲》雜誌總編輯陳文和先生和副總編輯鍾春蘭女士也屈駕來聽講指教，並賜贈《客家風雲》創刊號。花了半天工夫，把其中重要的文章讀了，覺得很感動，也觸動了我一些感想。

我出生在鶴佬語區的鄉下，所以小時候沒機會學客家話，直到大學時代和客家同學一起求學，由於我從中學起便對漢語方言學感興趣，我可以說是爲了研究台灣方言才進中文系的，所以一旦碰到客家同學，便把握機會學客家話。我的老師是陳光秀同學。我以楊時逢先生的「桃園客家方言調查」做爲教本，努力學習，不到一個星期便能用客家話講故事——當然不可能講得很好，但是我卻對客家人和客家文化有了粗淺的認識。我因爲懂得一點客家話，和客家人相處更是融洽。尤其那些不會鶴佬話的老人，對我更是倍覺親切。如果我不懂幾句客家話，便只有相見兩無言，目瞪口呆了。

語言是一種傳達意思的工具，語言不通，意思傳達中斷，感情便無法交流。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，語言是人與禽獸之間極少的差異之一。過去閩客之間曾經發生械鬥，其間或是由於經濟利益分配問題，或是由於司法訴訟問題（如嘉義新港的陳辦事件），但根本原因在於封建的籍貫意識，而語言問題會加強這種籍貫意識。因為語言和民族往往是競合的，語言相同會增加族人之間的認同感、親和力。語言的親和作用，成了語言的工具性之外的另一特性，而兩者之間是具有因果關係的。

台灣籍貫間的械鬥，還有所謂「漳泉拚」，漳泉雖同屬鶴佬族，但其中有方言差，所以會增加其籍貫意識。但漳泉之間只有方言差，經過兩百餘年，漳州腔、泉州腔互相調整，逐漸融合成不漳不泉的所謂「台灣話」，「漳泉拚」也成為歷史的名詞。可是閩客間是語言的不同，雖然客語在鶴佬語的人口優勢下，大量吸收了鶴佬語詞彙，終究無法和鶴佬語融合成一種語言，閩客之間的矛盾還是無法消除。不過日據時代由於日語的教育，閩客、山地之間得到一種共通語，基於命運的相同，遂用這種共通語做為團結反日的工具。戰後的國語教育，台灣人再次得到一種不同的共通語，做為團結反體制的工具，閩客乃至山地人之間的民族嫌隙可說已降至最低了。

由於語言的工具性和親和力，現代國家無不制訂一種或數種官方語言或「國語」做為團結民族內部或民族之間的工具。基於台灣的經驗，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反對共通語的制定。

然而共通語或「國語」不可加以神聖化，將之崇拜為耶和華之類唯一的真神。理由是：

1. 「國語」的選定，往往只因為它是多數或強勢民族的語言或政府所在地的語言，不一定就是文化最高的語言、歷史最悠久的語言，或表達力最強、發音最美的語言。日本定東京話為「國語」，只因為它是首都的語言，可是關西的語言比東京話更優秀、歷史更悠久，卻受「國語」的排斥，所以關西人不服氣，有些人主張訂關西話為「第二標準語」，便由於這個原因。

2. 不管非國語的所謂「方言」是否優秀，它既是「母語」，在情感上便不能容忍受排斥。語言是民族的姓氏，失去了母語，在個人是失去了民族歸屬感，在民族言，是民族的覆亡。所以「改姓」是「背祖」，改變母語也是「背祖」，「母語情結」和「民族情結」實在是一體之兩面，同樣是無法抹殺的。「鄉音不改鬢毛摧」是千古名句，至老不改鄉音，是中國人的一種驕傲。可是現在有一批喪失母語的異鄉人卻希望台灣人也同樣丟棄母語，這是出於一種同歸於盡的心理，無法令人接受的。

3. 語言是文化的根，語言消失，文化也必然隨之消失。平埔語在台灣消失，平埔族的文化在那兒了？平埔文化消失，平埔族也滅亡了。這是民族的悲哀，也是人類文化的損失。不同風情的文化，對異文化的民族具有一種無可言喻的魅力。旅行觀光的目的，不止要看不同的山光水色，更要看那不同風情的文化。我們不但要「欣賞」異文化，更要為人類「傳承」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，而其根本之圖，便是傳承自己的母語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。然而九十年來，台灣文化問題、語言問題竟成為「問題」，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。

基於這三點理由，我一直強烈主張保護母語，發揚母語文化。不止台灣鶴佬話，客家話、山地話也是我所關心的。我不願再見到台灣有語言、文化消滅的事。如果有人關心稀有動物滅種，卻對民族語言文化的滅種漠不關心，甚至額手稱慶，這是喪心病狂。

我在許多文章裡，提到「台灣話」時是把鶴佬話、客家話、山地話都包括在內的，甚至有時也包括台北國語。我主要的研究對象是鶴佬話，但在這篇文章裡我要為客家話和客家文化說一句話。

在台灣，雖然鶴佬、客家、山地三系的語言文化同樣受到國語文化的威脅，而有絕滅的危機。但鶴佬話因為人多勢眾，還有一點生機，但客家話和山地話則危機重重。

依《客家風雲》雜誌的調查，三十歲以下客家人之間使用客家話的只有四三%，子女不會客家話的有三二·一%，家庭中不使用客家話交談的有三五·五%。

這個數字比起黃宣範教授的調查顯然偏高。依黃教授在台灣筆會的演講和我對他當面請教的資料，大學生之中不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有二二·四%，但鶴佬人不會鶴佬話的只有一·二五%，而其中有四分之三母親是外省人。黃教授的調查又顯示，客家人同輩兄弟之間有一〇%不用客語、與下一輩不用客語有一九%，而鶴佬人分別是九%和七%。

兩者的不同起因於取樣的不同，《客家風雲》取樣的對象偏重於都市的上層階級，黃教授取樣的對象包括鄉下人。

但無論如何，鶴佬話和客家話都正在衰退之中，而客家話的危機比鶴佬話更深。我們比較語言的競爭力時，舉出人口優勢、文化優勢和政治優勢。鶴、客語在文化、政治上都處於劣勢，但鶴佬語在人口上仍佔優勢。客家話則連人口上都居劣勢。這是客家話比鶴佬話更受威脅的理由。

在這種情勢下，客家人如何保存客家話呢？我以為：

一、心理建設是最重要的，客家人對自己的語言、文化應當要有自尊心、自信心、愛心，缺乏這「三心」，客家語言文化必然會消失。所謂「哀莫大於心死」，此之謂也。客家文化受到鶴佬文化很深影響，只有客家話和山歌比較能保存特色，這是客家族最可寶貴的遺產。山歌不止是音樂，更是文學，客家知識份子要多參與創作，然後根據既有的基礎去發展，也許可能脫胎換骨，創造出台灣客家風格的新文化來。這才是客家人對台灣文化的貢獻。如果不是立基客家文化的傳統，空言創造新文化，那樣的「進步」，可能只是「被同化」的代名詞而已。越「進步」只有越加速客家文化的衰亡，降低客家人的地位。

二、要求在客語區實施客語服務、客語教學，增加廣播、電視的客語節目比例。語言必須使用才能保存下來，如果客家話在社會上無用武之地，退縮到家庭之中，必然會趨於消滅。這在歷史上已有過前例。客家話原來在鶴佬語區有許多方言島，比如桃園北部、豐原東部、彰化中部、雲林北部、嘉義溪口鄉附近等，但現在呢？據我的調查，不是已經完全消失，便是奄奄一息。當然這是形勢所逼，無可奈何。但客家在桃竹苗屏仍有廣大的分佈區，這個客家區必須以提昇客家

意識，發揚客家傳統文化爲手段才能固守得住。而其根本之圖，便是奪回客家話的教育權和使用權。

三、客家人大部聚居於貧瘠的山區，謀生不易，人口大量向鶴佬區移民。就客家區而言，可以算是僑民。這批僑民分散各地，日久必成「鶴佬客」或「國語人」。他們也許暫時還能懷抱客家情懷，但終究無法維持客家特質，這是無可奈何的事，前述客家方言島的消失便是血淋淋的例子。儘管如此，客家人仍可運用一些變通辦法，比如把客家子弟送回家鄉成長，成長後教子弟多觀賞客家話節目，開辦講習班，教授客家語言文化等。當然這是很困難的事，卻是客家知識份子應該努力的目標。

不宜膨脹人口數量

現在我要談一些認同的問題。這個問題的正確認識和鶴客和諧相處有密切關係，必須好好研究。

客家人在認同上發生了困境。原因之一是腳踏台灣，自然在意識上認同台灣，但卻如同山地人一樣，屬於少數民族。有人把客家人的比例膨脹爲四百萬，佔台灣人口五分之一，這是沒有根據的。根據一九三〇年台灣總督府發表的調查報告，廣東籍佔全台人口一五%，但其中潮州人屬鶴佬人，戴國輝教授說客家人佔台灣人中的一三%是比較接近的數字。戰後擁進大量外省人，客

家人的人口比例應該降在一〇%左右。把人口比例膨脹到兩倍以上，再看客家人在台灣經濟上、文化上、政治上的地位及利益分配不及自己想像的比例數字，便會產生被害意識，心理不平衡，對鶴佬人或外省人產生敵對意識。相反的，如果正確認識到客家族人口雖然只有一〇%，但在各方面的表現都超過這個比例，那必然會產生自信心、自尊心、光榮感，因而更增強客家意識。因此我認為不斷吹噓膨脹客家人的人口比例，對客家意識的培養是不利的。對其他族人來說，如果相信客家人真正佔台灣人口五分之一，但其表現不成比例，對客家人的評價就會降低，反之，其表現超過人口比例，對客家人就會刮目相看。在我看來，客家人的表現已經超過其人口比例，是一個可敬的民族。

其次，所謂認同，可以分析為國家認同、土地認同、思想認同、文化認同、民族認同。在封建時代，族群之中，所有成員，上述的認同是自然一致的，並被要求一致。因此生為客家人，便無可選擇地必須和族人的認同意識一致。但近代個人主義興起，這種認同的一致性便崩潰了。尤其是思想認同最難一致，父子兄弟，一為左派、一為右派，一是國民黨、一是民進黨，是司空見慣的事，客家人把票投給鶴佬人，不投客家人也是家常便飯。反之亦同。

客家人的認同困境還表現在國家認同和土地認同的矛盾。如果是認同中國，便自然以北京話為國語，希望以北京話和鶴佬人溝通。如果鶴佬人堅持使用鶴佬話，便會產生被排斥感。如果不認同中國，也不一定對鶴佬話心服口服。其中還摻雜一些深怕被鶴佬人同化的危機意識，因此寧

可用日本話或北京話和鶴佬人溝通。

《客家風雲》雜誌載有一篇鍾孝上先生的〈我有話要說〉，他對於俗稱鶴佬話爲「台灣話」或「台語」感到不服。並且對「黨外開會及演講都絕對不用黨外所謂的北京話，而固執地偏用閩南話即黨外所謂的『台語』」表示反感。這是他參加黨外或民進黨最大的委屈。他曾建議黨在開會時使用國語，但毫無效果，但他並不氣餒，他「決心爲了客家人的權益及尊嚴，要跟他們力爭到底。」鍾先生同樣的意見已撰文發表過好幾次。省議會的客籍議員也曾在議會中使用客語質詢，以示和鶴佬語對抗。

鍾先生對客家人的熱愛和勇氣令人敬佩，但我覺得其中似乎摻雜了一些認識不清和感情用事，對於鶴客團結有不利的影响。

我們該知道，北方官話被當成中國話的代表已有千年歷史，明清以北京話爲官話，民國改稱爲「國語」，成爲中國的標準語，自有其條件。官話有北方官話、西南官話、下江官話，方言差不大，南腔北調，不妨溝通，人口佔七成。以文化上、政治上最居優勢的北京話爲代表，無論是否認同中國，都不應該抗拒以北京話做爲中國共通語。

台灣鶴佬語的使用人口居台灣總人口七成以上，比官話在中國的人口比例還大，因此在台灣具有代表性，如果認同台灣，就不應該排斥這樣的語言做爲台灣共通語。

再推論下去，如果是在苗栗，鶴佬人居少數，客家話具有代表性，鶴佬人也不應排斥客家話

做爲苗栗共通語。

鍾先生觀念的癥結，在於誤以共通語只能有一種。其實國家有國家的共通語、地方有地方的共通語，實際可以並行不悖。印度便是最好的例子。民進黨是台灣地區的一個政黨，並不是中國全國性的政黨。台灣的政黨在台灣開會，何以不可以使用台灣大多數人使用的台灣共通語——鶴佬語發言、演講？

其次談到尊重和尊嚴的問題。尊重是互相的，多數要尊重少數，少數也要尊重多數；開會、演講，如果是在桃竹苗地區舉行，自然得使用客語，因爲客家人在這個地區是多數，可是在全台灣區開會、演講就得使用鶴佬話，因爲鶴佬人是多數。如果是在中國開全國性的會議，那非得使用北京話不可，因爲以北京話爲代表的官話人口在中國佔多數，如果是世界性的國際會議，非得使用英語不可，因爲會說英語的居多數。這是事實上的必要，不可以感情用事的。所以我以爲客家人離開客家區參加全台灣區的會議，應該學習至少聽得懂鶴佬語，不應該心存排斥。這樣才算真正的認同台灣。如果我移居桃竹苗，我一定努力學習客家話，和客家人打成一片。這不是空談，事實上是如此，我是嘉義人，說的是台灣優勢腔，但我現居泉州腔很重的石碇，我和石碇人說話，一定改用當地的泉州腔，我也教孩子上學說石碇腔，回家說優勢腔。當然這不一定必要，因爲不管是漳是泉，大家都聽得懂，但我儘量尊重多數人使用的腔調，以便和當地人打成一片。我不願去破壞當地的語言生態。

多數尊重少數的語言是很理想的，但不容易辦到。假定上述所舉的人口比例正確，鶴佬人和客家人的比例是八·五比一·三，客家人學習鶴佬語的機會就比鶴佬人學習客家話的機會大七、八倍，這就是爲什麼大多數的客家人都會鶴佬話，而鶴佬人不會客家話的道理。在這種情形下，如果少數堅持使用多數人不懂的語言，就必須透過翻譯，這就牽涉到翻譯的準確度、人才、經費、設備等問題。我們可以爭取在政府機關、議會中實行，但在民間團體可能很難執行。

鍾先生如果真正要在民進黨爭取客家人的尊嚴，應該爭取的是客家人以客家話發言的權利，然後要求翻譯。

如果民進黨的人才、經費都到了有足夠能力爲少數的客家人、山地人黨員的發言翻譯，將顯示民進黨不但是個強大的政黨，而且是真正「民主進步」，太好了。

但是可惜，鍾先生所爭取的不是這樣的「尊嚴」，卻是要求鶴佬人黨員不可說鶴佬話，眞真是違反「民主進步」的主張。少數不尊重多數，如何要求多數尊重少數呢？

我這樣的論調，對客家同胞可能會是一種壓力。因爲客家人要認同台灣和鶴佬人相處必須多學一種語言，鶴佬人卻不一定須要學客家話，顯然客家人的負擔比較重，這話是事實。但我不是站在鶴佬人的立場說話，而是站在社會語言學的立場說話。社會語言學注意的是語言使用的事實，而不是理想。如果世界上統一成一種語言，當然最方便、最理想，但不可能實現。少數民族走出自己的語言區，不可能要求別人按照自己喜歡的語言說話，只能入境隨俗，設法適應。

如果我是客家人我會這樣想：好在生為客家人，有機會學習更多的語言，開展更寬廣的文化視野，增加更多的機會。如果我是鶴佬人，我可能不懂客家話，如果生為外省人，也許連鶴佬話都不懂。生為客家人，何其幸運！客家人的表現好過鶴佬人，其原因當在於此，豈不是嗎？

（原載一九八七《客家風雲》二：二〇—二五）